

“我日看四种报,所费时间,以贵报为多”

——叶圣陶致徐开垒书信掇要

■马国平

叶圣陶先生与《文汇报》的关系源远流长,在《文汇报》的各个时期不同版面上留下了他的珍贵笔墨。检视叶圣陶在《文汇报》发表的文章,最早可回溯到1938年该报创始之年,在“世纪风”副刊发表了七言长诗《不惜令随焦土焦》(1938年8月9日)。粗略估计,叶圣陶以本名在《文汇报》发表文章约七十篇,近半发表在1977年至1984年间。时任《文汇报》文艺副刊主编的徐开垒与叶圣陶互相之间信函往来,保持了较多联系。

叶圣陶致徐开垒的书信始于1962年9月10日,“惠书诵悉。《笔会》每日出一大版,闻之欣喜。贵报越来越好,处处见得出工夫。我日看四种报,所费时间,以贵报为多。承嘱作文,义不容辞”。徐开垒在信纸边上写有注释:“这封信是叶圣老在1962年9月写的。当时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以后不久,由于纠正了‘大跃进’和‘反右倾’的错误,报纸版面做了些革新,曾受到各方面的欢迎。”

1977年,叶圣陶应徐开垒之邀,在当时名为“风雷激”的《文汇报》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七绝诗《金猴诛白骨》(1977年3月20日)。

关良同志以所绘孙猴打白骨精彩色画见赠,作此酬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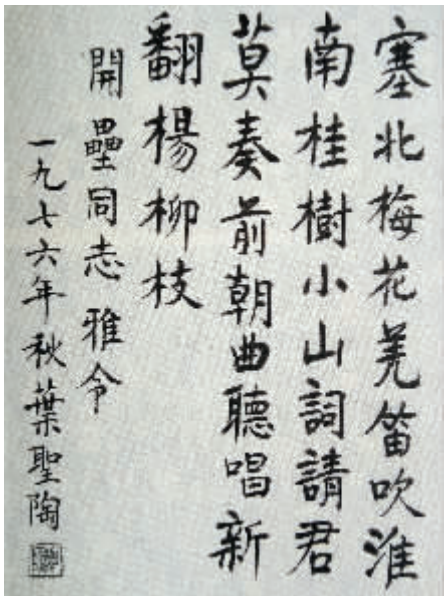
妙绘金猴诛白骨,寄情禹域复光华。睽违半纪犹相念,共此欢怀遥拜嘉。

(注)与关良同志不相见者逾五十年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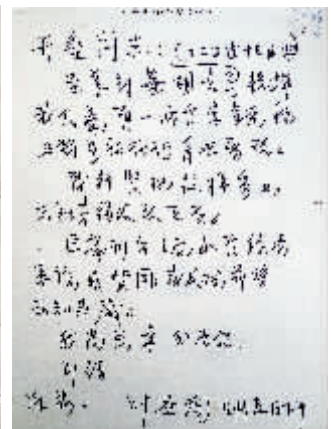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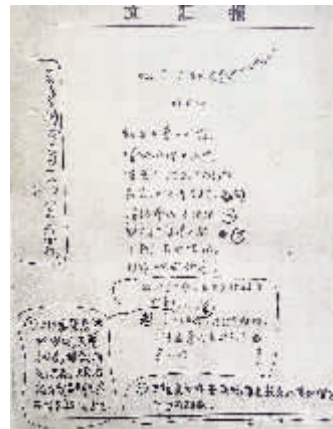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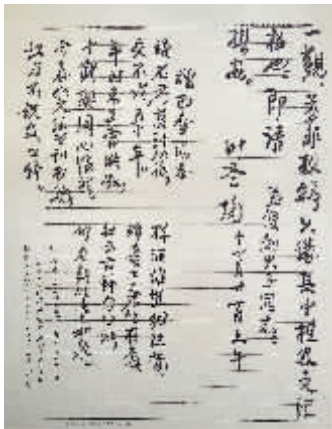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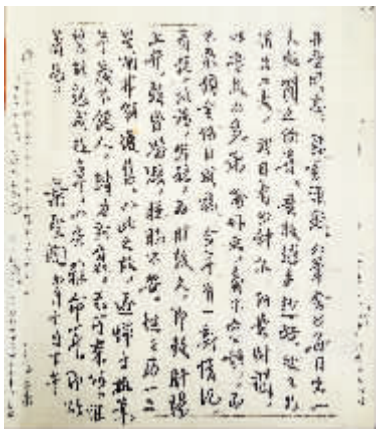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,徐开垒重新负责《文汇报》文艺副刊工作后,主动向老一辈作家艺术家邀约征求诗文作品,努力促使那些在“十年浩劫”中受迫害被压抑的作家艺术家登台亮相,文艺副刊成为当时推动文学创作的重要舞台。叶圣陶的诗文发表是目前所知的第一篇,他在接到徐开垒3月4日的约稿信后,于3月8日和9日先后寄来诗作四篇。徐开垒及时刊登了其中的《金猴诛白骨》七绝诗,并且配上了关良先生的画作《金猴奋起千钧棒,玉宇澄清万里埃》。叶圣陶在3月25日回信写道:“我处订阅《文汇报》,拙诗与关良同志之画同刊,足下用心颇好,良佩。睽字误排为睽,稍为缺憾。他诗诚如尊论,自不需刊载,我绝无意见。”

1977年5月25日,巴金先生在“风雷激”文艺副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《一封信》。同年11月2日,叶圣陶作诗《巴金兄索书作此赠之》,他在当天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:“前复巴金书,允为写字,近日作成一诗赠彼,即书而寄之。近日忽然欲了此事,则以昨夜小林之来访也。”随后他又于11月21日把这首诗抄寄给徐开垒:

诵君文,莫计篇,交不浅,五十年。平时未必常晤叙,十载契阔心怅然。今春《文汇》刊书翰,



叶圣陶与徐开垒亦师亦友。图为叶圣陶书赠徐开垒。



叶圣陶分别于1962年9月10日、1977年11月21日、1979年3月27日、1981年9月5日致徐开垒的信函。

识与不识众口传。挥洒雄健犹往昔,蜂豸于君何有焉。杜云古稀今日壮,忙看新作涌如泉。

信中写道:“近日作一诗赠巴金同志,录请一观,并非投稿,只缘其中提及《文汇报》也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信中,叶圣陶提到徐开垒为《文汇报》“教育版”向他征稿,“本月十四日手书诵悉。教育版嘱我作文,义不容辞,我可以说的也很有一些。只是我年来更不能用心思了,稍用心思就睡不好,一连几天不舒服。只能说愿意写些,可是不能说定时日。尚希垂谅”。两年多后,反映叶圣陶教育思想的《晴窗随笔》专栏文章源源不断地出现在《文汇报》的教育副刊上,1980年1月3日至5月15日共计发表一十三篇。以后又有多篇文章发表在教育副刊上。新时期后叶圣陶在《文汇报》发表作品中,很大一部分是与教育有关的文章。

类似内容的文章也发表在文艺副刊上,如《学作文的途径——读鲁迅〈人生识字糊涂始〉》(1981年9月10日),该文署名为“桑宁”。当时,徐开垒向叶圣陶约稿,叶至善与父亲商量后打了个草稿,“字写得核桃大”。他在致徐开垒的信中写道:“父亲花了一整天改了一遍,我才誊清了寄上。父亲不愿意署他

的名字,也不要署我的名字,因为许多人看到了仍然知道是他的。所以我起了个‘桑宁’的笔名。”(1981年8月29日)“桑宁”,按苏州方言来读,是否就是“双人”的意思?

叶圣陶后来还在徐开垒寄来的清样上校改。他对这篇文章萦怀于心,在回信中写道:“这篇刊出后,如有读者来信,或赞同,或反对,希望示知为感。”(1981年9月5日)文章发表后,真的有读者来信表示商榷,徐开垒把这些信都寄往了北京。因此,这篇文章应该是叶圣陶的佚文。

1979年中,叶圣陶先生致徐开垒书信十一通之多,内容涉及诸多方面,表现了叶圣陶对社会现象的关注。譬如两次写信对报社发布广告内容的纠错,“我想请足下代为向贵报领导同志建议,与登广告的厂家和广告公司郑重商量,凡属此类广告,务必认真校核,正确书写。报社在付印之前,必须有负责人员看过。这样才不至于有此类错误。贵报同志对此看法如何,甚盼告知。”(1979年5月9日)徐开垒把这些信件都转给报社负责人,并由报社指定人员向叶圣陶先生回复。

1979年8月,徐开垒赴京采访叶圣陶和曹禺,徐开垒与曹禺不熟,特地请柯灵写了介绍信,

再由巴金附笔签名。徐开垒与叶圣陶已有前期接触和了解,因而叶圣陶的日记里有“徐开垒来访”的记载,也曾的回信中答复徐开垒问题。据笔者所藏徐开垒采访手记记录,他为撰写叶圣陶采访记前后四次拜访了叶圣陶先生。《一代师表——访叶圣陶》发表于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期间(《文汇报·笔会》1979年11月7日),徐开垒后来又据此扩充改写题为《长者风仪》(《当代文坛报》1983年第三期),其中的内容材料也被以后的一些叶圣陶传记著作所引用。

《一代师表》并非徐开垒有关叶圣陶的第一篇文章。早在1945年10月出版的《作家笔会》(柯灵主编)一书中,就有徐开垒写的《叶圣陶》一文,那年他才二十三岁。他在文章中描述了在东吴大学听过叶圣陶先生的演讲,同时不无骄傲地回忆了1936年在叶圣陶等人编辑的《新少年》征文时,从一千二百三十篇应征稿件中获得第一名的往事。“后来据人说,这次稿件的评阅确是由叶先生担任的。可见不但叶先生的作品为我所爱读,认为他是前辈作家中最切实的一个;同时我的作品,也为他认作少年学生中写得最真实的一篇呢。——(朋友,请你宽恕我的忘形,因为这确实是

我生平最得意和最侥幸的一件事!)”这段话不无透露出少年得意的情愫和作为私淑弟子的荣耀,获奖征文因此成为徐开垒不能忘怀的文学创作的处女作。徐开垒在1979年给叶圣陶写信,曾讲述当年获奖的情况,叶圣陶也为此感到高兴,“前数日接长函,乃知足下与我早结文字之缘,不禁欣跃。”

正是徐开垒与叶圣陶存在着这样的因缘关系,徐开垒在担任文艺副刊主编期间,发表了不少叶圣陶诗文作品。一次,徐开垒抄得叶圣陶怀念丰子恺的诗作,叶圣陶收信后欣然写上注解于1979年3月27日寄回徐开垒(《怀念子恺》刊《文汇报》1979年4月11日)。

徐开垒在1945年所写的《叶圣陶》一文中有一句话颇有意思,“因为崇拜他,我当时也很快活”。这种情感上的追随,创作上的源流,成为徐开垒终其一生的“快活”。直到晚年,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写道:“我在今天不但记得叶圣陶和柯灵,他们是发表我第一二篇文章的领路人。”

(叶圣陶致徐开垒书信凡十九通,徐开垒生前分两批捐献给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。笔者撰写本文时曾查阅原件,特致谢忱。)